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

China's Geostrategy in the New Century

doi:10.30390/ISC.200305_42(3).0003

問題與研究, 42(3), 2003

Issues & Studies, 42(3), 2003

作者/Author：顧立民(Li-Min Ku)

頁數/Page：57-7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5_42\(3\).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5_42(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

顧立民

(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教官)

摘要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係對於中共所處的亞太區域周邊地理環境作一概述，作為後續研究的客觀背景。第二部分則就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在冷戰時期與冷戰後時期地緣戰略思想的變化，以及冷戰後中共學者幾種主要的地緣戰略觀加以描述與分析。第三部分則由經濟利益、國家主權與意識型態等三項地緣戰略內涵要素分析為起點，進一步建構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的構型與格局。

關鍵詞：地理環境、地緣戰略、經濟利益、國家主權、意識型態

* * *

壹、前言

地緣戰略 (geostrategy) 是依據一定地緣條件分析、研究國家 (地區) 間戰略關係的互動變化，揭示國際形勢發展趨勢，以及戰略格局演變與調整，為國家確定戰略方針和對外政策提供依據。^①概言之，地緣戰略是制訂國家安全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依據，也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基本因素之一。

構成一個國家的地緣戰略關係的地理因素，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自然地理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國土大小、國土形狀、自然資源、國都、邊疆國界等；以及人文地理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文化和軍事綜合實力、人力資源的有機構成及分佈、民族宗教和社會力量的結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定位及對外政策特徵等。^②

中共建立政權長期以來，避而不用地緣戰略一詞，而代之以戰略地理學 (strategic geography)。所謂的戰略地理學主要在探索地理環境對戰略制訂與實施的影響，亦

註①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2。

註② 中共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66、67。



即戰略上運用地理條件的規律，為科學預測戰爭的發生與發展、制訂戰略方針、戰略原則與戰略計畫，籌劃戰爭準備，指導戰爭實施等提供地理的科學依據。^③其定義與地緣戰略間有相當程度的共通性，但地緣戰略研究的範圍又較戰略地理為廣，也較常為大部分學者所採用。

從地緣戰略的層面來觀察，中國大陸為亞太地區主要國家，中共也向以本區域大國自居，認為本身屬於冷戰後多極國際格局中的「一極」。而隨著冷戰時期結束，中共的地緣戰略思維也隨著世界局勢變化而轉變，揚棄以往毛澤東那種片面側重意識型態對抗的僵化思維，而代之以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彈性地緣戰略觀，試圖將全球化因素納入其理論體系架構之中。

本文首先對於中共所處的亞太周邊地理環境作一概述，提供後續研究之客觀背景，並就由對其地緣戰略觀的演變分析，試圖描繪出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的內涵、構型與輪廓，以為學者進一步研究其國家戰略之參考依據。

貳、中共周邊地理環境概述

中共是亞太地區的大國，在其國際戰略佈局上，亞太地區不僅是其重要的周邊環境，更是攸關國家生存發展的關鍵地區。^④從自然地理環境來看，亞太地區一般指由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大洋洲、美洲西部與太平洋、東印度洋等區域構成的廣大地區，包括了歐亞大陸的東部、南北美洲的西部與大洋洲；其中包括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康藏高原，一系列的島嶼，如自千島群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群島、加里曼丹等島嶼組成的第一島鏈，以及白令海峽、宗谷海峽、津輕海峽、對馬海峽、台灣海峽、巴士海峽、麻六甲海峽等諸多海峽等。^⑤

從人文地理環境來看，亞太地區包括世界第一及第二的經濟大國（美國、日本），以及軍事強國（美國、俄羅斯），五大擁有核武國家中的三個（美國、俄羅斯、中共），而世界上十個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除了巴西與奈及利亞外，其餘均位於亞太地區。^⑥此外，此一地區尚包括北太平洋航線（由美國、加拿大西岸經太平洋北部至中國大陸與日本沿岸）、中太平洋航線（由美國西岸經夏威夷、關島到中國大陸、日本與東南亞各國），以及南太平洋航線（由南美洲西岸經澳大利亞，到東南亞各國）三條世界主要航海線。

註③ 董良慶，*戰略地理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4。

註④ 江澤民即曾表示：「中國實行全方位開放，首先是面向亞太地區。中國重視並積極參與和推動本地區的經濟合作，加強同亞太國家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請參見江澤民，「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2年11月21日，版2。

註⑤ 有關亞太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區域敘述請參見朱陽明主編，*亞太安全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36、37。但文中主要探討之地理區域仍以中國大陸周邊地區為主體，特此說明。

註⑥ 這些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其中中國大陸、印度、日本、印尼、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的國土全部位於亞太地區，另外美國與俄羅斯則部分國土位於亞太地區。



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是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集團，對蘇俄等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實施圍堵政策的主要戰場，雙方透過區域結盟與局部戰爭等和戰手段，在此地區進行了近半個世紀的競爭。冷戰結束後，美蘇兩大陣營緊張對峙的狀態雖已獲得緩解，世界格局朝向多極化趨勢發展，但多數學者所公認的「五極」勢力，包括美國、中共、日本、俄羅斯與歐盟，除歐盟外其餘四者勢力均交匯於此，在此一地區均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利益。

此外，本地區由於歷史因素或是自然資源因素，目前仍存在著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日俄北方領土問題（即北方四島問題）、日韓竹（獨）島問題、「中」日釣魚台問題、南海主權問題與克什米爾問題等，是目前世界上未決爭端「熱點」最集中的區域之一。凡此，均使得本地區在新世紀繼續成為「海洋勢力」與「大陸勢力」相互競爭的主要區域，也使其戰略環境具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

中共的領土面積約 960 萬平方公里，南北長約 5,500 公里，東西寬約 5,200 公里，形成西部深入亞洲腹地，東南面向太平洋的地理形勢。其位處於大陸與海洋連接的邊緣地帶，是陸地勢力與海洋勢力消長的關鍵國家，並與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毗連，其影響可直接波及四周地區。此外，中國大陸沿海是環太平洋地區的重要經濟戰略通道，周邊國家如日本、南韓及東南亞等國均依賴此一戰略通道，且為溝通太平洋、印度洋與連結亞洲、非洲、歐洲的海上要道。^⑦

由於中國大陸的地理位置恰好居於太平洋戰略區與歐亞大陸戰略區的交匯處，使其地緣戰略在形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海洋勢力與大陸勢力兩股戰略力量，在此一地區進行戰略競爭的影響。從戰略環境的角度觀察，中國大陸既是一個陸地大國，也是一個臨海大國，使其必須同時負擔海陸兩個方向的防衛任務。從陸地方面而言，遼闊的陸地空間雖然為其提供了戰略防禦上的廣大空間，但也為其帶來了 15 個陸地接壤的鄰國，^⑧而這些鄰國的組成民族、宗教、經濟發展互異，存在著區域內與區域外的重大差異與矛盾，對中共的周邊安全造成潛在影響。從海洋方面而言，中共與 6 個國家以海為鄰，^⑨而中共周邊沿海，除渤海為其內海外，其餘黃海、東海與南海均與其他國家共有，均存有海域主權分割、資源分配、島嶼歸屬等問題，其中南海蘊藏資源的歸屬分配紛爭更為嚴重，成為其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問題。

叁、中共地緣戰略思想的演變

概括而言，地緣環境賦予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自然空間，是客觀且無法自由選擇的；而地緣戰略則是國家處於此一受限的客觀環境下，為維護自身利益所做出的自由

註⑦ 有關中國大陸詳細地理位置與環境分析內容，請參閱沈偉烈、陸俊元主編，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年），頁 150、151。

註⑧ 15 個陸地接壤國家包括：北韓、俄羅斯、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越南、錫金。

註⑨ 6 個以海為鄰國家包括：日本、南韓、菲律賓、汶萊、印尼、馬來西亞（不包括台灣）。



選擇。而由於中共採行集權專政的政治體制，使其國家的地緣戰略觀，極大程度地取決於領導人對於當時國家所處地緣環境，以及外在威脅情勢的判斷與決策。

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來，其地緣戰略觀的演變大致可以蘇俄解體作為分界，區分為冷戰與冷戰後兩大時期，其中冷戰時期主要包括毛澤東的「世界革命」地緣戰略觀時期，以及鄧小平的「和平發展」地緣戰略觀時期；而冷戰後時期則以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集團的「全球化」地緣戰略觀時期為主，茲分述如下：

一、冷戰時期的地緣戰略思想

中共在冷戰時期的地緣戰略觀，可以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為分野，之前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時期，之後是鄧小平的「和平發展」時期。毛澤東時期的地緣戰略觀，受到無產階級意識型態的影響甚大，他繼承了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不斷革命」的原理，^⑩以「革命」中心作為其戰略環境認知的基本思維，提出「繼續革命」的口號。^⑪

基於其「戰爭」與「革命」的戰略環境認知主軸，毛澤東的地緣戰略思想，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是以蘇俄作為其在國際間的支撐，將整個世界一分為二，一邊是帝國主義陣營，一邊是社會主義陣營，出於共產主義意識型態與無產階級革命經驗，中共選擇了向蘇俄「一邊倒」。^⑫在蘇俄於一九五〇年代後期開始表現出脫離革命路線的行為，並與美國出現修好的跡象後，^⑬毛澤東一方面為應付美蘇夾擊的威脅，另一方

註⑩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的結尾表示：「他們（指無產階級）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盡快採取自己獨立政黨的立場，一時一刻也不能因為聽信民主派小資產者的花言巧語而動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組織的信念。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75。

註⑪ 毛澤東認為「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你們講，那個時候還有沒有革命？我看還是要革命的。」請參見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318。

註⑫ 毛澤東強調「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並且強調國際援助的必要性，反對接受英美的援助。請參見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1405~1419。另外，在其「共同綱領」中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請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十一條內容，轉引自中共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0（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頁60。

註⑬ 1959年9月赫魯雪夫訪問美國，喊出「大衛營精神」，象徵兩國的修好。



面為貫徹其「世界革命」的理想，^⑭開始逐步調整其地緣戰略思維。毛澤東便先後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以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分別提出「三個主義」的國家分類，^⑮以及有關「兩個中間地帶」的地緣戰略概念，^⑯將中間地帶視為其與美蘇抗衡的戰略支撐，大力開展與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第一個中間地帶國家的外交關係，並且和緩與西歐、日本的對立程度。

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以後，毛根據其對於美、蘇威脅程度差異的判斷，^⑰除與美國開始關係正常化的近程外，並先後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及「三個世界」的地緣戰略規劃：所謂「一條線」即是沿大致的緯度畫一條線，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大陸、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線，並團結這條戰略線以外的國家（即『一大片』），以抗衡對雙方均有威脅的蘇俄。^⑱而所謂「三個世界」即是將美、蘇視為第一世界，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是第二世界，亞洲（日本除外）、非洲與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⑲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後，鄧小平開始修正毛澤東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後，所一再強調的「世界革命」與「全面備戰」觀點，認為雖然戰爭的因素依舊存在，但制止戰爭的因素也在增長，避免戰爭，維持和平是有希望的。^⑳而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

註⑭ 學者趙全勝認為毛澤東關於中國是一個革命政權和中國必須支持其他國家革命的思想，在當時（1960年代至1970年代後期）北京的最高領導階層中佔據主導地位。請參見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台北：月旦出版公司，民國88年），頁93。

註⑮ 毛澤東表示「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這三個主義中，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比較接近。而民族主義佔領的地方相當寬，有三個洲：一個亞洲，一個非洲，一個拉丁美洲。」請參見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08。

註⑯ 毛澤東對於「中間地帶」的定義為：「講到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份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國家，一部份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於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的壟斷資本是不滿意美國的。」其中前者為毛澤東與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談話的節錄，後者為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波兼光等人談話的節錄。請參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44、345。

註⑰ 當時中共領導階層認為中共雖然與美國在越南間接作戰（即中共對越共提供支援），但不至於發展為直接作戰，而蘇聯在中共北方邊境陳列重兵的威脅更大於美國，同時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人向中共中央呈遞了「從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寶島樹」、「對戰爭形式的初步估計」等報告，判斷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強調應利用美蘇矛盾，緩和中美矛盾，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請參見熊向暉，*歷史的注腳—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頁184~197。

註⑱ 李寶俊，*當代中國外交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27。

註⑲ 毛澤東對於「三個世界」的分類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請參見毛澤東，「關於第三世界劃分問題」，*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441、442。

註⑳ 鄧小平在1980年初即表示「我們有信心，如果反霸權主義鬥爭搞得好的話，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請參見鄧小平，「目前的形式和任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05。



後，由於「中」蘇關係逐漸改善，鄧小平對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判斷更趨於樂觀，進一步認為制止戰爭的力量，已經超過戰爭的力量，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①

鄧根據他對於戰爭與和平的判斷，進一步提出「和平與發展」問題，作為其地緣戰略規劃的思想基礎。一九八二年初他開始提出「南北」、「東西」與「南南合作」^②，一九八四年他進一步表示當前世界存在兩個基本問題，第一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南北問題。^③到了一九八五年，他正式提出「和平與發展」問題，其中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而以南北（發展）問題為核心。^④

自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此一植基於戰略環境觀察與國家利益考量的客觀地緣戰略思維，開始取代毛澤東時期那種單純以意識型態對抗為主的主觀地緣戰略思維，迄今仍對於中共的國家戰略規劃深具影響。

二、冷戰後時期的地緣戰略思想

在「中」蘇冷戰期間（一九六〇年代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中共認為最主要的威脅來自北方的蘇俄。進入冷戰後時期，由於來自北方的威脅已大幅減輕，加上經濟競爭的全球化趨勢與面向海洋發展的呼聲漸高，以往「重陸輕海」的傳統地緣戰略思維已有明顯改變。^⑤

而中共學者陳峰君認為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的戰略安全呈現下列特點：^⑥

（一）在總體上呈現相對穩定的局面，但仍有許多現實或潛在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諸如美俄的互信問題；區域國家的邊界、領土、領海爭議及民族宗教衝突；歷史遺留的國家分裂問題（南北韓與台灣）。

（二）大國間的相互制約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區域的均勢狀態，但大國間的利益競爭，也加深了不穩定與不確定的程度。

（三）區域各國間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強化了相對穩定的均勢狀態，但經濟競爭的強度可能造成自然均勢狀態的脆弱性。

（四）東亞國家競相加強本國軍事力量，形成新的軍備競賽，對亞太安全利弊互見。

註① 鄧小平在 1985 年時表示：「我們多年來一直強調戰爭的危險。後來我們的觀點有點變化。我們感到，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請參見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05。

註② 于化民、胡哲峰，當代中國軍事思想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98。

註③ 高屹，「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論述」，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年），頁 37。

註④ 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105。

註⑤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研究中國歷史，將中國傳統的地緣戰略思維歸納為：（一）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威脅是來自亞洲內部。（二）中國向來較不強調海權。（三）保持相對的道德優勢，對於中國的戰略思維而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請參見 James Lilley and Richard Solomon, "Strategic Perspectives," Hans Binnendijk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eds., *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8), p.48.

註⑥ 陳峰君，當代亞太政治與經濟析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47~151。

(五) 亞太地區缺乏地區性安全機制。

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全球化（globalization）此一概念開始被學術界所重視，而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全球化已成為一種主流概念，廣為大眾所接受與運用。^②近年來全球化趨勢的增加，主要是由於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電子通訊技術的突飛猛進，形成一個如同人類神經系統一般的通信網路，使人們感覺到世界是一個整體。此外，由於國際貿易的增加、國際資金的廣泛流通，以及勞力資源的需求，使得資本與生產開始向開發中國家外移等因素，促使全球化的作用在各國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各領域中加速發酵。^③

江澤民在二〇〇二年中共「十六大」的報告中，也將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視為國際格局發展的兩大趨勢，再次認為新的世界大戰在可預見的時期打不起來，中共將可以獲得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與良好的周邊環境。但同時也強調國際政治經濟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依舊存在，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仍有可能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發展。^④

概言之，冷戰後時期中共所處的地緣戰略環境有其和緩的一面，也有其險峻的一面。從和緩面來看，隨著冷戰結束，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相對大幅降低，國際環境也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狀態，有利於中共發展其經濟建設。從險峻面來看，中共面對海洋勢力國家的包圍，必須由沿海、近海、近洋、遠洋，逐步建立起海權優勢，以維護其生存發展所必須的戰略通道，拓展其國家安全空間。

三、冷戰後幾種中共的地緣戰略觀

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中共所處的戰略環境產生了兩項主要變化：一方面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與改善，中共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獲得迅速的發展，同時中共於一九七一年取代我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使其國際整體局勢趨於和緩，國際地位大為提昇。^⑤但是相對而言，另一方面由於美蘇兩大國對於集團內部成員的控制力減弱，各國間國家利益的競爭逐步取代意識型態的對立，使得中共與周邊國家的既存紛爭紛紛浮上台面，使其周邊情勢日益複雜。^⑥

註② 馬爾孔·瓦特斯（Malcolm Waters）著；徐偉傑譯，*全球化（Globalization）*（台北：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89年），頁1、2。

註③ 王逸舟主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9、10。

註④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轉引自解放軍報網頁（<http://www.pladaily.com.cn>）。

註⑤ 1972年9月，中共與日本政府發表建交聯合聲明。另外自1970年起，中共先後與義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希臘、西德、冰島、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西方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中」英、「中」荷關係也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並於1975年與歐洲共同體建立了正式關係。上述有關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資料請參見中共外交部網頁（<http://www.fmprc.gov.cn>）。

註⑥ 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於2001年12月20日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便表示目前與今後的國際局勢的基本發展是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盪。請參見中共外交部網頁（<http://www.fmprc.gov.cn>）。



面對與昔日截然不同的戰略環境變化，中共學者近年來從全球與區域格局導向，提出各種地緣戰略觀。首先，在全球格局導向的地緣戰略觀方面，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陸卓明首先提出新的「三個世界」分類的地緣戰略觀，他將陸地視為所謂非障礙區，是人類政治經濟活動的重心，而將海洋視為障礙區，是人類通行各非障礙區的重要通道，以及重要資源區。並根據世界政治經濟地理關係，將世界分為「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美蘇兩大超強，第二世界是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第三世界則是廣大的開發中國家。基於此一分類，強調世界存在的三種國際地緣關係，第一種是「東西關係」，即是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間的對抗關係；第二種是「南北關係」，主要是北半球的工業發達國家與南半球開發中國家的貧富差距關係；第三種是「包圍與反包圍的關係」，即是因為東西對峙引起並含有南北對抗成分，以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為主體的圍堵與反圍堵關係。^②

基本上，陸氏的觀點並未脫離毛澤東「三個世界」與鄧小平「和平與發展」地緣戰略思想的範疇。而中共軍方學者王生榮則提出所謂「三環」地緣戰略觀，即是以中國大陸為核心，以同心圓方向，由內而外分為三環：^③

(一) 第一環是「環中國海」區域。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等四個近海海域。主要戰略目標在於所蘊藏的大量海洋資源、海上運輸通道及海上安全，而台灣海峽被視為重要戰略次區域，且成為目前此一環節的缺口。

(二) 第二環為「陸地周邊」區域。包括東北亞（俄羅斯、蒙古、朝鮮半島）、中亞（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南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與東南亞（緬甸、越南、寮國等）。主要戰略目標在於維護國家邊界安全，及作為國家安全戰略佈局的緩衝地帶。

(三) 第三環為「全球佈局」區域。以所謂「五極」為主體，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共、日本與歐盟，而又以歐亞大陸為中心，主要戰略目標在維持多極均勢格局，避免美國霸權擴張，或以結盟方式對中共形成包圍。

其次，在區域格局導向的地緣戰略觀方面，學者胡鞍鋼、楊帆等人由歷史的長期

註② 陸卓明表示：「人類以相對狹小的非障區（陸地）作為政治經濟的重心區，在使用非障區資源的同時又向廣大自然障區（海洋）索取資源，並穿行自然障區而互相關連。根據世界政治經濟地理結構，可將世界上的國家和地區分為「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第二世界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第三世界座落在中低緯度的發展中國家。三個世界各類國家和地區位置決定了國際關聯的三個主要地理方向：南北關聯（主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矛盾關聯）；東西關聯（主要是兩個超級大國及其政治軍事集團間的矛盾關聯）；包圍與反包圍的關聯（主要是由東西關聯引起並帶動著大量南北關聯的關聯方向）。並根據政治經濟重心區的類型，劃分出兩大主要國際通道系統：一是關聯蘇俄、中東歐國家與蒙古，以鐵路為主的『大陸系統』，另一個是關聯所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以航海線為主的『海洋系統』，這兩大系統在歐亞大陸的外圍交會。」請參見陸卓明，「當代世界政治經濟地理結構」，全國經濟地理科學與教育研究會經濟地理教學研究班論文，1982年7月，轉引自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5、56。

註③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頁298~305。



發展事實觀察出發，提出「南北向」的地緣戰略觀。^④他們認為中國的地緣戰略主要為南向與北向：北向是以武力抵禦北方來犯的外族，南向則以文化、經濟為動力開發生活所需。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地緣戰略方向仍是南向與北向，其中北向是以陸地戰略為重心，目前不安定的變數主要來自蒙古與朝鮮半島，其首要任務在於防止這兩個地區可能的政治軍事變化，努力維持東北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而南向是以海洋戰略為重心，含有兩個層面，一是致力於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對內海保持有效的海上控制權；二是爭取經濟利益及優勢。

中共軍方學者董良慶則認為在中國大陸周邊存在著一條V字型熱點線，V字型線的左邊是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大陸線，從中亞地區的塔吉克、阿富汗，到南亞的喀什米爾、「中」印邊界，到東南亞的「中」越邊界與柬埔寨，是一條沿邊線。V字型的右邊是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的海洋線，從日俄的北方領土爭議，日韓的竹（獨）島爭議，朝鮮半島分裂對峙，中共與日本、南北韓的大陸棚爭議，到台灣海峽與南海海域，是一條沿海線。^⑤由於這兩條線都相當靠近中國大陸的領土與領海區域，且中共與大部分的紛爭熱點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使此一V字型線成為中共必須重視的地緣戰略線。

另外一位中共軍方學者程廣中則是從陸海防形勢的角度觀察，提出所謂「三線」地緣戰略觀，即是將中國大陸分成三條線：^⑥

（一）北—西北線。指與中國大陸北部和西北部相鄰的俄羅斯、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等5國。這條線是一條陸地地緣線，該地緣線的國家中，有3個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蒙古則長期為前蘇聯的軍事政治同盟國，俄羅斯對這些國家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由於中共與這些國家都維持相當友好的關係，使此一防禦線在未來長時間內是比較穩定的。

（二）西線。指與中國大陸西藏與新疆地區接壤的印度、不丹、錫金、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與孟加拉等7國。這是一條高原地緣線，除印度外，其餘都是中、小型國家，雖然「中」印兩國間存在著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以及印、巴問題，但是由於此線有喜馬拉雅山脈作為天然屏障，即使發生軍事衝突也將侷限於邊境地區，故此一防禦線也是較安全的。

（三）東—南線。指與中國大陸東部和東南部有陸地相鄰或隔海相鄰的日本、南韓、寮國等13個國家，其中以日本與印尼兩個海洋鄰國為主。這條線包括了對中共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海上運輸線路，更包含了台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南沙群島主權爭議問題、「中」日釣魚台問題、「中」越領土爭議問題等熱點，形勢最為錯綜複雜，彼此利益糾葛與競爭的情形也最為嚴重。再加上第一島鏈的多數國家（如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向來與美國關係密切，對中共形成包圍態勢，且中共在沿海防線上缺乏前

註④ 胡鞍綱、楊帆，大國戰略—中國利益與使命（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8~33。

註⑤ 董良慶，戰略地理學，頁88。

註⑥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頁216、217。



進部署基地，使其成爲中共地緣戰略上最具隱憂的一條防禦線。

肆、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的內涵與格局

一、中共地緣戰略的內涵

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爲「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⑦而這些自然條件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人們所遇到的其他條件。^⑧毛澤東在「實踐論」一文中也指出「人的認識，主要第一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⑨

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上層建築（包括國家政治與意識型態）是隨著與其相應的下層建築（即經濟基礎）的建立而建立，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甚至一切精神層面的事物，如思想、觀念等都離不開物質利益。^⑩由此一唯物主義觀點加以延伸，可以瞭解到國家利益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一個國家在建構國際戰略時的出發點。而在國家利益中，又以經濟利益爲最主要的核心利益，它決定著國家政治、文化與安全利益。

在毛澤東時期，中共的國際戰略佈局，主要是著眼於不同意識型態陣營的對立，往往是爲了反對而反對，具備相當的侷限性。^⑪鄧小平掌權之後，他特別強調應該淡化純粹以意識型態對抗爲主的消極態度，改以國家利益作爲國際戰略規劃的重心。^⑫而在評估國家利益的核心所在方面，鄧小平提出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作爲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⑬他與江澤民都一再強

註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頁23、24。

註⑧ 葉汝賢，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32。

註⑨ 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259、260。

註⑩ 樂志強，實踐唯物主義體系探索（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64~266。

註⑪ 中共學者李寶俊指出「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外交中，始終存在著聯合誰、反對誰的問題，而在兩者中，聯合誰往往是爲了反對誰，常常強調的是後者。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外交的交往對象受到一定限制。在50年代，中國外交交往的對象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60年代主要是亞非拉國家，70年代仍然是以作爲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爲主。」請參見李寶俊，當代中國外交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56、157。

註⑫ 鄧小平曾表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的差別。」轉引自康岩，「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時期黨的對外工作的光輝指南」，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頁198。

註⑬ 中共在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是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請參見韓華泰主編，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十五大，下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頁628。



調經濟因素的優先地位，認為經濟問題與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間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④據此江澤民也同時呼籲世界各國應該揚棄冷戰時代，著重軍事實力競賽的舊安全觀，強調建立以非軍事力量競爭為新的新安全觀。^⑤其主要是建立在中共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上，而其涵蓋領域則相當廣泛，包括了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環境、文化與社會安全等一系列的安全思想，其中仍以經濟安全為核心。

由於持續繁榮的整體經濟情況，是中共在面對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瓦解局勢時，對內維繫共產政權，爭取民衆對於一黨專政政治體制認同；對外緩和與周邊國家關係，反制西方國家和平演變長期戰略的最主要對策。因此，中共仍會將經濟發展列為其首要政策，而經濟因素也將繼續成為中共地緣戰略內涵的核心。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傳統的國家主權是構成其地緣戰略的另一核心，從鄧小平開始，即明確表示將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放在所有考量因素的第一位，強調主權問題沒有任何討論的空間，更進一步提出「國權」與「國格」的觀念，來反駁西方國家藉口「人權」、「人格」來侵犯國家主權的說法。^⑥江澤民也多次指出國家的主權和統一不容他國侵犯，國家的內政不容他國干涉，樹立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口號，尤其對於西方世界在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表示不滿。^⑦

從領土問題的角度來檢視中共的國家主權觀，可以發現在其地緣戰略中，諸如中亞邊界、「中」印邊界與南海諸島等領土紛爭問題，是屬於次要問題；而台灣問題則是

註④ 鄧小平在1990年代初期即強調：「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請參見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54。此外，江澤民也指出：「經濟優先已成為世界潮流，這是時代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必然。……發展不但關乎各國國計民生，國家長治久安，也關係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經濟的確越來越成為當今國際關係中最首要、關鍵的因素。」請參見江澤民，「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4年11月16日，版1。

註⑤ 江澤民在1997年與俄羅斯共同發表的一份外交聲明中指出：「雙方主張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識的安全觀，認為必須揚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或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以對話協商促進建立相互瞭解和信任，透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請參見江澤民，「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97年4月24日，版1。

註⑥ 鄧小平表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此外，鄧還強調「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請參見鄧小平，「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2、330、348。

註⑦ 江澤民多次表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少數幾個國家壟斷和操縱國際事務，是行不通的。」「在國際交往中，我們絕不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強加於人，同樣，也絕不允許別國將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強加於中國。」「人權問題說到底是屬於一個國家主權範圍的事，我們堅決反對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請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5~38。



核心問題。鄧小平在一九八四年便已提出擱置主權爭議，代之以共同開發的想法。^④中共在二〇〇〇年三月與五月，分別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展開邊界協定會談，並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塔吉克共和國與吉爾吉斯共和國關於三國國界交界點的協定」。並根據「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原則，分別與寮國、越南及印度簽訂了邊界條約與相關和平協定。^⑤而在南海問題上，在一九九二年舉行的東協外長會議上，中共則與東協國家達成「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共識，緩和此一區域的緊張情勢。^⑥相對於次要主權領土問題的解決方式，中共對於台灣問題則是從未鬆口。造成此一差異的原因，除了軍事與經濟戰略上的考量外，取得對台灣的控制權，更具有「統一全國」的政治性意義，以及向歷史與人民交代的重要意識價值。^⑦

意識型態是構成中共地緣戰略內涵的第三個重要因素。雖然自鄧小平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共奉行「不以意識型態定親疏」的外交政策路線，不再單純以社會制度與意識型態作為建立關係的標準。^⑧但與此同時，中共仍然強調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對於共黨遂行統治的重要性。^⑨冷戰末期東歐與蘇俄的政治與社會體制劇變，其所引發的自由化浪潮，帶給中共不小的衝擊。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更大力提倡「和平演變」的論調，想趁此時機使中國大陸放棄社會主義道路。

大陸學者探討蘇俄瓦解的因素時，認為意識型態的失控，是其產生劇變的根本內在原因，而西方國家長期對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則是重要外部成因。^⑩鄧小平也

註④ 鄧小平在1984年2月22日接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便表示：「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發，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請參見鄧小平，「穩定世界局勢的新辦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49。

註⑤ 中共與寮國簽訂了「中寮邊界條約」，與越南簽訂了關於解決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協議」，與印度簽訂了「中印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與「中印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有關中共與鄰國領土邊界事務資料請參見中共外交部網頁（<http://www.fmprc.gov.cn>）。

註⑥ 馬晉強主編，當代東南亞國際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頁279。

註⑦ 如同香港與澳門是西方列強帝國主義遺留的歷史問題，台灣問題則是西方霸權主義所造成的歷史問題，1980年代鄧小平會對香港與澳門問題表明立場，認為「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請參見鄧小平，「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2、13。

註⑧ 顧德欣主編，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63。

註⑨ 鄧小平表示：「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又有代表那個階段最廣大的人民利益的奮鬥綱領。因此我們才能夠團結和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叫做萬眾一心。」請參見鄧小平，「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90。

註⑩ 王悅楠，「試論意識型態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俄羅斯研究，第5期（1999年）。轉引自薛小榮，「十年來關於蘇聯劇變原因研究綜述」，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3期（2002年），頁126。



表示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同時面對著反「左」與防「右」的問題。^⑤為了避免左傾路線復辟，中共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並將之與社會主義道路結合，創造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避免重蹈蘇聯過左與僵化的教條思想覆轍。在防右上則是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對於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陰謀，^⑥並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反對西方國家干涉「中國」的內政，以及提出「國權」與「國格」，以反駁西方國家所說的「人權」與「人格」，將其專制獨裁的作為與民族主義掛勾，以激發民衆的民族主義情感，在意識型態上，為其一黨專政的統治賦予合理性。

江澤民上任後，持續強調抵禦西方敵對勢力「西化」與「分化」的戰略圖謀，宣稱西方國家企圖在政治上用多黨制與議會制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在經濟上用資本主義私有制取代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同時利用一切機會，分裂黨、民族與國家，使「中國」重新陷入舊時那種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局面。^⑦大陸學者也認為，自「蘇東波」之後，西方國家即利用社會主義遇到的挫折、合作與交流的渠道，以及信息技術的優勢，對中共進行意識型態的滲透。^⑧近年來，中共高層發起「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與「三個代表」（即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的講政治就在於確立領導幹部的政治路線，將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引以為戒。^⑨而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其中的部分重點就在加強群衆的精神文明武裝，抵禦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的侵蝕。^⑩

二、中共地緣戰略構型與格局

根據上述關於中共地緣戰略內涵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國家主權、意識型態與經濟利益是構成中共地緣戰略構型的三項基本要素，而中共本身與其他國家間的領土與

註⑤ 鄧小平表示：「搞社會主義，搞四個現代化，有「左」的干擾。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擾。所謂右的干擾，就是要全盤西化，不是堅持社會主義，而是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請參見鄧小平，「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225。

註⑥ 鄧小平表示：「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請參見鄧小平，「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26。

註⑦ 張玉良主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戰略規劃—學習江澤民同志關於國際戰略的論述（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164、165。

註⑧ 劉正斌、越碧波，「保持黨的先進性必須大力抵制西方意識型態滲透」，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 5 期（2001年），頁 64。

註⑨ 中共領導階層認為「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要建設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認為戈巴契夫受西方影響的「新思維」，搞垮了蘇聯、蘇共、東歐共產集團以及戈巴契夫本人。請參見王長存，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輔導講話（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 98。

註⑩ 甄言主編，三個代表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頁 61。



主權問題、意識型態的對抗態勢，以及經濟利益的競爭格局，是構成此一構型的外部環境主因。

國家主權是地緣戰略構型的根本所在，它與意識型態間具備產出的關係，由於國家主權的絕對性與獨佔性，在內部主觀認知與意識型態外部環境對抗的影響下，使人為的產生出與之相適應、特有的意識型態。而它與經濟利益間的關係是妥協的關係，主權問題的外部環境，經常與經濟利益相衝突，決策者在衡量兩者間的得失利弊後，會對國家主權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

意識型態在地緣戰略中扮演一種連結與平衡的角色。它對國家主權有強化的功用，意識型態是由於國家主權的存在而產生，而它在回饋的過程中，將視國家主權對於經濟利益妥協的程度，透過意識型態的對抗，適度強化國家主權的力度，以維持整個構型的平衡。而它對於經濟利益則是具有遏制的功能，藉由意識型態本身的強化，遏制經濟利益競爭所形成的分化作用。

自從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經濟利益一方面是中共國家利益的重心，另一方面也是在國際戰略佈局上的突破力量。它對於國家主權產生支持的作用，亦即不斷成長的經濟利益，將有助於維繫人民對其國家主權（共產政權）的支持。而由於經濟利益代表的是一種開放思想，對於意識型態為主的保守勢力，自然而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分化作用。

我們如將此一地緣戰略構型，配合中共所處的客觀國際局勢，以及主觀對外政策路線表現，則可以概略勾勒出中共地緣戰略格局的雛形。在此一格局中，「第三世界」（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仍然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如果以已開發國家與未開發國家的標準作為分類標準，則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中屬於「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與中共有正式外交關係者合計為一〇八國，佔中共所有外交國家（一六四國）的三分之二（六七%），對於中共的國家主權具有相當重要的支撐力量。^⑥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一篇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在第三世界存在有下列重要利益：^⑦

（一）政治利益：包括防台（灣）反彈外交的主戰場、與西方國家進行人權鬥爭的主要盟友、謀求大國地位的主要依托，以及推進世界格局多極化的重要舞台。

（二）經濟利益：包括是遏制西方經濟制裁與改善國家經濟安全環境的重要戰略選擇、石油安全戰略的重心，以及潛在的商品與資源市場。

（三）國家安全：呼籲「中國」應密切注意大中東（包括中東與中亞區域）的形成，對於中共國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並重視中亞的地緣戰略價值。

註⑥ 作者計算標準係將日本與新加坡列為已開發國家，其餘均為開發中國家。相關中共建交國家數目係計算至2001年底止，請參見中共外交部網頁（<http://www.fmprc.gov.cn>）。

註⑦ 有關第三世界對於中共的重要性分析，請參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當代第三世界透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年），頁424~432。



在區域地緣戰略格局方面，中共近年來積極與俄羅斯及中亞國家發展外交關係，^③在西面建立起一個區域地緣戰略小三角，作為其在亞太區域與美、日為首的海洋勢力對抗之有力支撐。從前一小節有關冷戰後中共幾種地緣戰略觀的敘述中，可以獲知北面及西面是中共認為最穩定的地緣戰略線，中共與此一區域的多數國家都維持著友好關係，只要「中」俄關係不產生惡化，則北線與西線將不致有重大變化。南線方面雖然存有與印度的邊界紛爭，但中共一方面與巴基斯坦維持親密關係，藉以制衡印度；另一方面仍與印度維持一定程度的交往，避免雙方關係過度惡化，加上天然地理屏障，南線基本上也是較穩定的。

至於東線則由於中共本身海軍實力有待加強，以及海洋四通八達的地理特性，加上與此一地區的許多國家都有領土或利益的紛爭，使得東線最具危險性。但在東線方面，東協各國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雖然這些國家與中共之間存有南海主權爭議與「中國威脅論」的疑懼，但基於彼此歷史上的文化關係，以及日益增加的經濟互賴關係。如果中共能在領土主權問題上，與印度及東協國家達成協議，同時避免侵犯印度的區域霸權範圍，^④則中共、印度與東協有可能成為另一個潛在的區域地緣戰略小三角。^⑤

目前，中共在東、西兩側，同時受到以美、日為首的海洋勢力，以及以歐盟為首的北約勢力的夾擊，其中以東側為主要的意識型態衝突線，西側則為次要的衝突線。無論中共想成為亞太區域霸權，甚或成為真正的世界強權，首要之務都必須要在東、西兩面尋求突破。短期內由於其軍事力量的落後與不足，仍將以經濟實力作為主要的突破力量。中共近年來大力提倡「西部大開發」，積極建設西部腹地，使之成為全球經濟戰略佈局的重心，形成東向與西向兩條主要經濟戰略進攻軸線，其形如一張兩面弓（如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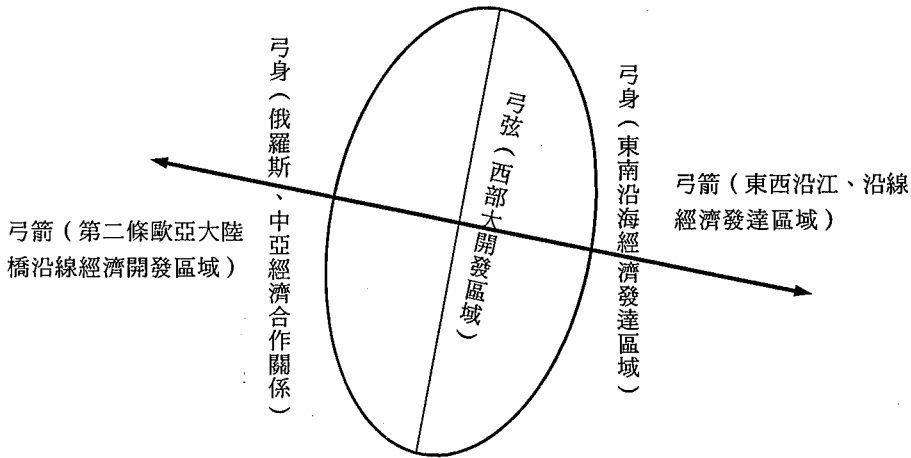
註③ 中共除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外，並先後於 1996 年和 1997 年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與「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積極建立全方位的合作關係。

註④ 印度向將南亞次大陸視為其勢力範圍，如印度學者 K. M. Panikkar 即表示：「除非印度洋能自由通航，除非印度的海岸線得到了充分的保護，印度的工業發展、商業增長以及政治結構的穩定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印度洋必須真正成為印度的洋。」K. M. Panikkar, *India and Indian Ocean* (London, 1945), p. 84. 而另一位學者 V. P. Dutt 也表示：「印度洋之命名為印度洋證明其對印度重要性。地理上，印度是通向東南亞和中亞的門戶，印度對兩側地區的事態發展不能置若罔聞。」V. P. Dutt, *Indian'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6), p. 2. 轉引自孫士海主編，*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14。

註⑤ 另有學者從全球角度著眼，認為「中」美俄、「中」美日、「中」美歐與「中」俄印等四者，是未來影響中共安全極為重要的四個大三角關係，亦極具參考價值，讀者可同時參酌閱讀。請參見李五一等著，*大國關係與未來中國*（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86～425。



圖一 中共全球經濟戰略進攻軸線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東向部分，中共於一九八五年開放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洲為經濟特區，並依據沿江、沿線開放政策，逐步建立以長江中、下游沿江與隴海鐵路沿線重點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開放地帶。透過東西部間橫向的鐵、公路運輸聯繫，建立起西部內陸戰略後勤後方基地與東南沿海戰略後勤前沿基地間的運輸幹線，將兩者連成一片，向東面做經濟力量投射，突破海洋勢力的包圍。

在西向部分，中亞區域位處歐亞連接點與戰略輻湊區，蘇俄的解體與中亞各國的獨立，改變了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也帶給中共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共學者認為此一變化對於中共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安全環境，以及經濟合作的機會。^⑥預估中共未來將以西部作為腹地，透過與俄羅斯及中亞各國的經濟合作作為，沿著第二條歐亞大陸橋前伸，積極拓展與歐盟各國的經貿關係，向西面做經濟力量投射，突破大陸勢力的包圍。

伍、中共未來地緣戰略走向預測—代結語

西方學者，尤其是美國的學者，對於中共未來的地緣戰略走向多偏向一種「新興霸權」的觀點。例如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冷戰後中共在世界事務上訂下兩大目標：鼓吹中國文化，凝聚所有其他華人世界的向心力，並恢復十九世紀以

註⑥ 中共學者邢廣程認為中亞各國獨立，使中共在西藏獲得廣大的戰略緩衝地帶，成為除外蒙古之外另一個與俄羅斯間的戰略中間地帶，也使中共得以與中亞各國開展新的經濟合作關係。但同時他也指出該地區的民族主義，以及極端的宗教主義，有可能對中共產生負面影響。請參見，越常慶主編，中亞五國概論（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頁348、349。



來喪失的歷史定位，躍居東亞霸權。^⑥而另一位學者毛思迪（Steven W. Mosher）則將中共對霸權的追尋分為三個階段：^⑦

基本霸權：收復台灣，並控制南中國海而不引起任何爭議。

區域霸權：將領土擴充到全盛時期的清代疆域。

全球霸權：在全球各地與美國對決，摒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代之以中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

冷戰後，由於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使中共的地緣戰略由以往的內縮與封閉，轉變為外擴與開放，對於成為世界區域強國，乃至於世界強國，展現出較以往更為強烈的信心與企圖。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在二〇〇一年底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將未來中共的外交工作方針歸納為「冷靜觀察，沈著應對，把握機遇，因勢利導」十六字。^⑧與當年「六四事件」後鄧小平所提的「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外交戰略方針相較，^⑨顯示中共自認在國際戰略上，已經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撐，應從穩定中尋求進一步的突破。

中共未來的地緣戰略規劃，除了持續鞏固與第三世界的良好關係，扮演好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與維護者的角色外，將全力推動其「大國外交」。誠如江澤民所言：「當今世界，是一個正在走向多極化格局的世界，一兩個大國和大國集團主宰世界事務，支配其他國家命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⑩中共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大國關係成為世界格局的基礎，建立大國關係即為中共國際戰略的重點。美國雖為超強，但在推展許多國際事務上，仍需要其他區域大國的合作與協助，加上這些區域大國（如俄羅斯、日本、中共、歐盟）在全球或區域內的影響力逐漸增強，使得大國關係日益重要。

在重視大國關係的國際外交趨勢影響下，中共積極在主權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以及政治、經濟與軍事等領域，建立起大量的伙伴關係。冷戰後所建立的大國關係，與冷戰時代的同盟關係，其最大的不同在於強調關係國家間的平等互惠原則，以及與其他伙伴關係的非排他性，是多數國家與區域組織建立與維持多邊協調與平衡局勢的一種戰略作為，而中國大陸崛起的現實，則是中共建立伙伴關係的重要動力。^⑪

從長期發展的歷史觀點來看，中共多年以來，其對外戰略的路線大都著重與大陸

註⑥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86年），頁226、227。

註⑦ 毛思迪（Steven W. Mosher）著；李威儀譯，*中國新霸權，中國的企圖：支配亞洲與世界*（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90年），頁135。

註⑧ 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2001年12月20日接受人民日報專訪談話，請參見中共外交部網頁（<http://www.fmprc.gov.cn>）。

註⑨ 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21。

註⑩ 江澤民，「在德國外交政策協會和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聯合演講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5年7月14日，版1。

註⑪ 有關伙伴關係詳細內容，請參見孫寶珊，「冷戰後國際關係中的伙伴關係」，魯毅等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頁267～275。



國家的交往，使得大陸勢力對於中共的威脅程度大幅降低。而在經過冷戰時期近五十年的發展，以美國為首的海洋勢力陣營，已經形成以第一島鏈為前沿，第二島鏈為後盾，^③對中共軟包圍的態勢。

未來中共將持續以經濟發展作為國家首要目標，維護海上通路的順暢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基本手段，無論是採取攻勢或是守勢，提昇海洋戰略地位將是中共必經之路。這使得中共在地緣戰略規劃上，將持續視以美、日為首的海洋勢力，為威脅其國家生存發展與利益的主要力量，並將地緣戰略規劃的重心置於與海洋勢力的對抗。同時，美國仍將是中共在推動地緣戰略上的最主要潛在對手。對於美國而言，她的全球政策一定要與海權的日本維持密切的關係，其歐亞地緣戰略更需要與陸權的中國保持合作關係，而其對於中國建立地緣強權的容忍範圍，也將成為「中」美地緣戰略衝突的界限。^④

中共學者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進一步成為世界的超強國家，一九九九年三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以武力攻擊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區。同時建立了所謂「北約戰略新概念」，包括依靠美國與北約的軍事力量，建立一個獨立於聯合國之外的安全機制；將北約集體干預的範圍，擴大到全球範圍；藉由北約東擴，進一步壓縮俄羅斯的生存空間。^⑤而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高舉「反恐」的正義大纛，將力量伸展至中亞地區，對於中共以往認為屬於穩定的西線投入新的變數，同時積極拉攏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共的周邊國家（如斯里蘭卡、蒙古），對中共形成新的戰略包圍，對於中共的國家安全與地緣戰略整體規劃構成嚴重威脅。^⑥

因此，中共在新世紀將持續強調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實施「不結盟」、「反霸」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積極發展大國關係，參與國際組織與事務，堅持以聯合國做為解決國家主要紛爭的唯一機制。其戰略目標至為明顯，即是在目前一段時間內，在全球體系上繼續維持一超多強的局勢，在亞太區域則強調各主要勢力的均勢存在，阻止美國建立單極世界體系的企圖，並以建構多極國際體系作為長期發展目標。

在面對複雜的安全環境，中共在伙伴外交與大國戰略的觀念下，重新建構一個立足東亞，依托亞洲大環境的和平發展，再聯合環太平洋經濟圈的經濟實力，縱橫於美洲與歐洲，幫助第三世界的崛起，打破美、歐壟斷全球、獨霸全球的戰略構想。^⑦她

註③ 「第一島鏈」係指自千島群島、日本、琉球、台灣，到菲律賓的弧形島鏈、「第二島鏈」係指自小笠原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塞班島、巴布亞新幾內亞，到澳大利亞東岸的島鏈。

註④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林添貴譯，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88年），頁202。

註⑤ 王逸舟主編，單極世界的陰霾—科索沃危機的警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363。

註⑥ 宋國濤、金歌，中國國際形勢問題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174~176。

註⑦ 王崑義，全球化與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民國90年月），頁18。



的地緣戰略將不是單純的陸權思想，或是海權思想，而是融合兩者的一種綜合性的新地緣戰略思想：一方面鞏固其在歐亞大陸既有的陸權大國地位，以中國—俄羅斯—中亞區域戰略小三角為戰略支撐，與歐盟為主體的西方勢力，在西亞（中東）與東歐地區進行戰略競爭。另一方面則是面向太平洋地區，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全球戰略大三角為戰略支撐，與美、日為首的海洋勢力，在西太平洋區域進行戰略競爭。其主要目的是要成為一個背倚歐亞大陸，足踏西太平洋地區，能與美國在全球維持戰略均勢，必要時進行戰略競逐的海陸強權。

台灣位居第一島鏈的中心位置，也是東海至南海、東北亞至東南亞、太平洋西部至中東與歐亞各海上航線的必經之地，更是中共跨越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區域的戰略突破點。^⑧因此，在中共的地緣戰略規劃，尤其是海權為主的規劃上，台灣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戰略樞紐，取得對台灣的控制權，除了具有政治上「統一全國」的象徵性意義外，更重要的是在軍事上，可以使中共的海洋防禦線向前推進三百至五百公里，其海軍力量向北可直接進入東海、黃海作戰，向南可深入南海海域禦敵，向東則可前進到第二島鏈區域，對美、日等海洋勢力形成前沿部署，遏制海洋勢力的包圍態勢；除此之外，在經濟上更可提供海上運輸線路的進一步保障，必要時尚可切斷日本至南亞的海上運輸路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覬諸史實，中共以往歷次的對外軍事行動，如「中」印、「中」越戰爭等，都與其地緣戰略思想有所關聯。^⑨因此，在中共逐步實現其新世紀地緣戰略規劃時，台灣將首當其衝，面臨來自海峽對岸的嚴重威脅。此點乃是國人在觀察中共新世紀地緣戰略，以及思考台灣國家安全策略時，所必須重視的問題。

* * *

（收件：91年9月20日，修正：91年12月5日，接受：91年12月10日）

註⑧ 中共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戰略學，頁471。

註⑨ 例如，中共1962年發動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爭，即在遏制印度對雙方邊境「麥克馬洪線」控制區域的蠶食作為，以維護其西線地緣戰略線。而1979年對越南發起的自衛反擊戰爭，也是為了遏制越南在蘇俄支持下，在中南半島地區所進行的軍事擴張行動（主要是指入侵柬埔寨），以維護其東—南線地緣戰略線。



China's Geostrategy in the New Century

Li-Min Ku

Abstract

This essay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t begins with a basic description of the PRC's geographic environ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n it investigates the transformation in PRC geostrategic thinking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the Post Cold War eras. In addition,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PRC's major contemporary geo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Finally, it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configur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PRC's geostrategy in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C's economical benefits, sovereignty, and ideology.

Keyword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geo-strategy; economic benefits; sovereignty; ideology



參考文獻

- 于化民、胡哲峰（1999），《當代中國軍事思想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中共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1991），《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 1949-1990》，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6），《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2001），《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2001），《當代第三世界透視》，北京：時事出版社。
- 毛澤東（1966），《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77），《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7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9），《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生榮主編（2001），《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王長存（1999），《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輔導講話》，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王逸舟主編（1999），《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朱陽明主編（2000），《亞太安全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宋國濤、金歌（2002），《中國國際形勢問題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崑義（2001），《全球化與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
- 李五一等著（2002），《大國關係與未來中國》，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寶俊（1999），《當代中國外交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沈偉烈、陸俊元主編（2001），《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北京：時事出版社。
- 胡鞍綱、楊帆（2000），《大國戰略－中國利益與使命》，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孫士海主編（2000），《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馬克思、恩格斯（199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晉強主編（2000），《當代東南亞國際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高屹（1996），「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論述」，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張玉良主編（1998），《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戰略規劃－學習江澤民同志關於國際戰略的論述》，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陳峰君（1999），《當代亞太政治與經濟析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程廣中（1999），《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越常慶主編（1999），《中亞五國概論》，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 廉岩（1996），《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葉汝賢（2000），《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董良慶（2000），《戰略地理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熊向暉（1995），《歷史的注腳—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甄言主編（2002），《三個代表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趙全勝（1999），《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台北：月旦出版公司。
- 樂志強（2000），《實踐唯物主義體系探索》，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鄧小平（198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薛小榮（2002），「十年來關於蘇聯劇變原因研究綜述」，《南京政治學院學報》，3，124-128。
- 顧德欣主編（1998），《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